

STUDIES OF  
SHIJING  
IN ENGLISH WORLD

英语世界里的  
《诗经》研究

吴结评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TUDIES OF  
SHIJING  
IN ENGLISH WORLD

英语世界里的  
《诗经》研究

吴结评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晓萍(特邀) 吴雨时

责任校对:唐一丹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 / 吴结评著. —四川: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614-4235-7

I. 英… II. 吴… III. 诗经—英语—翻译—研究 IV. I207.22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5656 号

### 书名 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

---

|      |   |                         |
|------|---|-------------------------|
| 著    | 者 | 吴结评                     |
| 出    | 版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地    | 址 |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
| 发    | 行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书    | 号 | ISBN 978-7-5614-4235-7  |
| 印    | 刷 | 郫县犀浦印刷厂                 |
| 成品尺寸 |   | 148 mm×210 mm           |
| 印    | 张 | 7.5                     |
| 字    | 数 | 188 千字                  |
| 版    |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 价 | 20.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 序

文化元典是各民族得以存在的根，中国文化元典传入西方，被西方文人、汉学家奉为经典，而我们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化批判中远离经典，使蕴含其中的民族思维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失落，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表述方式。我们以西式话语建立起“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中国古代文论却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消亡，患上了“文论失语症”。在当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工作中，我们应该“返回语言之家”与“精神家园”，发现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优良传统，找到适合自我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以及学术规则。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失语症”至今，我和我的博士生群体便致力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跨文明研究”等系列工程，也从清理、对比文论范畴的研究逐渐走向文化探源的跨异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吴结平的博士论文《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就是以中国文化元典之一的《诗经》文本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多学科性为特征，在两种文明话语的对比分析中展开跨文明研究，其选题意义和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通观全书，首先，其最大的特点是：跨文明研究的双向阐发和“话语原则”的维护，即坚持自己的话语立场，在平等对话的

原则下，从差异处着眼，努力发掘不同文学传统各自存在的根基，在不同话语的基础上力图寻求对话双方的共识和理解，避免了将对话变成一家独白。例如，在第二章第二节里，她从立足本土的立场出发，从《诗经》创作的手法赋、比、兴入手，对“兴”与“be”展开双向阐发。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兴在最初是人们情绪高涨时随自然节奏的“举物而舞”，是前语言阶段以身体为符号的一种情感表达。当文字产生，作为载体去记录伴舞、乐而诵的歌谣之时，兴也随即由舞蹈的灵魂化为诗之精灵，渗透于诗的句首篇中，像散落的珠子在诗中熠熠生辉。这些兴象从世界中的自然客体化为主体的审美对象，进入主体的内心世界，在主客互动中上升为意象。因此，兴是汉字“观物取象”的呈现，即从主体所见、所闻、所触、所嗅、所尝的客观物像中提取主观意象，从举物盘旋，口发节奏的舞蹈中能体味到物我互动的强烈情感，而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兴发包容在两者的“间性”之中，它是向内深潜的情感发端，不是两者之间“ $1+1=2$ ”的等式，而是超越两者的意义溢出。这种意义的溢出来自触感而发的直觉性经验思维，是在情感冲突中感受到的“言外之意”，它不假求纯然的逻辑判断去获得明晰的意义，而是在所指的链条上，在主客相互感应的张力场中去体味意趣，由“在场”的能指表现无尽的“不在场”的所指。而“be”负载着西方“逻各斯”理念，使语言成为理性与逻辑的化身，强调语言的客体性、静态的分析性与可认证性，因而意义是固定、确证的，从而限制了相互兴发的弹性空间在主客之间（作者与文本）与主体之间（作者与读者、译者）的张力场中的自由想象空间，屏蔽了阅读与阐释的当下性和生动的鲜活性。

其次，文化探源式的比较研究和“异质知识”立场也是重要的特点之一，作者审视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以相互校正、融合与互补的态度进行对话，而不是简单的趋同，在和而不同的原则

下寻求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和谐发展。如第三章中“诗”与“poetry”的探讨,《诗经》作为文类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地位,以及“兴”作为《诗经》最重要的文类元素的意义。还有第四章中中国的寓言与西方 *Allegory*, *Allegoresis* 的探讨,以及《诗经》的寓言化阐释问题等。全书结构清晰,资料实,分析具体,图表和数据颇有说服力,文献综述也较为丰富,在西方诗经学和诗经学史的研究内容与特点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发掘,表现出作者的独立见解。

作为作者的导师,我由衷地为她的成果而高兴。当然,该书还有不足之处,语言表达尚可进一步打磨。但我相信以她脚踏实地、勤于思考的作风,她会再接再厉,继续探索。

曹顺庆

2008年12月18日

# 目 录

|                          |        |
|--------------------------|--------|
| 导 论 .....                | ( 1 )  |
| 第一章 《诗经》西播与研究概况 .....    | ( 10 ) |
| 第一节 西方诗经学的形成及其特征 .....   | ( 10 ) |
| 一、西方诗经学的形成 .....         | ( 10 ) |
| 二、西方诗经学的特征 .....         | ( 17 ) |
| 第二节 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 .....   | ( 21 ) |
| 一、译介阶段 (18—19 世纪) .....  | ( 22 ) |
| 二、研究阶段 (20 世纪) .....     | ( 29 ) |
| 第二章 《诗经》的翻译 .....        | ( 37 ) |
| 第一节 译本概述 .....           | ( 37 ) |
| 一、学者型 .....              | ( 39 ) |
| 二、半形似型 (韵体) .....        | ( 42 ) |
| 三、半形似型 (无韵体) .....       | ( 46 ) |
| 四、神似型 (自由体) .....        | ( 50 ) |
| 五、神形皆似型 .....            | ( 55 ) |
| 第二节 从赋、比、兴看《诗经》的翻译 ..... | ( 57 ) |
| 一、“兴”与“be” .....         | ( 58 ) |
| 二、比兴思维与《诗经》翻译 .....      | ( 63 ) |

|                                           |       |
|-------------------------------------------|-------|
| 第三章 《诗经》学研究(上)                            | (78)  |
| 第一节 诗体研究                                  | (78)  |
| 一、诗的起源及其文类意义——陈世骧《〈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诗学里的文类意义》 | (78)  |
| 二、苏源熙《〈诗经〉的重复、韵律与置换》                      | (100) |
| 第二节 文化人类学研究                               | (114) |
| 一、民俗学: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                     | (114) |
| 二、帕里-洛尔德理论:王靖献《钟与鼓》                       | (128) |
| 第四章 《诗经》学研究(下)                            | (136)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                                 | (136) |
| 一、高本汉《〈诗经〉注释》                             | (136) |
| 二、多布森《语言学证据和〈诗经〉创作年代》                     | (148) |
| 第二节 意象研究                                  | (159) |
| 一、美国学者余宝琳《寓言、寓言化与〈诗经〉》                    | (159) |
| 二、美国学者麦克诺顿的《〈诗经〉的复合意象》                    | (174) |
| 第五章 《诗经》学史研究                              | (189) |
| 第一节 海陶玮《〈韩诗外传〉与三家诗》                       | (189) |
| 一、《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                             | (190) |
| 二、汉代三家诗和《韩传》与《毛传》之关系                      | (195) |
| 第二节 左伊伦《诗歌与人格:中国传统的读解、注疏和阐释学》             | (198) |
| 一、志之内涵与人格                                 | (199) |
| 二、志之外延与兴                                  | (204) |
| 结 语                                       | (209) |
| 主要参考文献                                    | (217) |
| 后记                                        | (230) |



## 导 论

《诗经》是中国文学辉煌灿烂的源头，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自 16 世纪开始，《诗经》踏上了她的文化旅程，在与西方文学、文化四百多年的碰撞中，绽放出中西理论之奇花异朵。在方法论上，西方对《诗经》的译介和研究作了中西比较、西论中用、学科交叉、中诗西用等多种尝试。因此，《诗经》是一个富有极大潜力的研究对象，也是本书选择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为对象的缘由。

据目前所占有的资料，在国外，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方面，译介研究。在这一方面，始于对《诗经》的选译，如白晋的《诗经研究》，赫苍璧的《诗经选编》，宋君荣的《诗经》，《北京耶稣会士关于中国人的论丛》中韩国英神甫、西伯神父等的《诗经》翻译和《诗经》的长篇介绍。其后，全译本及分类介绍论文逐渐增多，如法国耶稣会士孙璋用拉丁文译有《诗经》，附有详细注解，1830 年巴黎著名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将其编辑出版，书名为《孔夫子的诗经》，这是刊行于欧洲的第一种《诗经》全译本。1843 年 11 月，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比奥（M. Edouard Biot，1803—1862）撰写了《从〈诗经〉看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载《亚洲研究》，1843

年)一文,该长文将《诗经》分为“华人体格”、“衣着”、“建筑和战争”等20个部分,并逐一进行讨论。此后,弗·吕克特(Freidrich Rickert, 1788—1866)转译了德译本,名为《〈诗经〉·出自孔夫子的中国诗集》。1844年,维克多·斯特劳斯(Viktor von Straus)出版了《〈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此书有一篇长达六十多页的序言,对《诗经》及其文化背景和影响作了概要的评述。此外,还有克拉默(Joham Cramer) (1844)和嘎伯冷兹(H. C. Von Gabelentz) (1864)的《诗经》德译本和佐托力(A. Zottoli)的拉丁文译本(1879—1882)。日本学者市川桃子从法国专门研究东方的学者哈维·圣·丹尼(Hervey-Saint-Denys)著作《唐代的诗》(1862)的序文中整理出作者对《诗经》的评价。该序文长达99页,题为《中国作品中的诗法及韵律法》,内容包括文学史和平仄之类的韵律法,从中可以整理出作者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对《诗经》持有什么样的看法。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有两部《诗经》俄译,他们是1855年司祭西维洛夫(1798—1871)和瓦西里耶夫(1818—1900)的《诗经》译稿,十月革命前后,沙俄和前苏联的汉学家对《诗经》十分重视,已知的节译本或诗篇就有15种以上。最早发表的单篇的译文,是1852年第1卷《莫斯科人》杂志上所载的《诗经》选译,题为《孔夫子的诗》。后来有米哈依洛夫、米勒尔等人译的《诗经》5首,载《中国和日本及其诗歌》(1896年)一书。又有1914年出版的叶戈里耶夫和马尔可夫的《中国之笛》一书中所收的《诗经·淑女》。十月革命后的译文,有奥列宁译《中国诗人诗经选·压迫》,载1925年《银幕》第45期。波兹涅耶娃译《七月》、《硕鼠》,载《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1956年)。伊茨译《破斧》、《伐檀》等5首,载《世界古代史文选》(1956)。波兹涅耶娃、斯特拉诺维奇译的《七月》等14首,载《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年)。1957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了什图金(1904—1964)的《诗经》全译本,共610页。第一部法文全译本是法国汉学家鲍吉耶(M. P. Pauthier, 1801—1873)所译的《〈诗经〉:作为正统经典的中国古代诗集》,是直接译自中文的著作,其中包括首次译成欧洲语言的《大序》全文。1896年,顾赛芬(Couvreur, Seraphin, 1835—1919)再次以法文翻译了《诗经》。继法国汉籍经典西译高潮之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再次掀起高潮。1871年,他的《诗经》英译本以《中国经典》第4卷出版,这是一部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译作,至今仍被西方奉为“标准译本”。在理雅各之后,英国于1891年又同时出版了阿伦(Clement F. R. Allen, 1844—1920)和传教士詹宁斯(M. A. William Jennings)的《诗经》译本。此外,19世纪发表的《诗经》选译文分别收入德庇时的《中国诗歌》、翟理思的《古文选珍》、韦德尔的《中国抒情诗》、克莱默·宾的《妇女的琴诗》等译著中。20世纪最为突出的两个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译作。韦利的翻译,第一次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次序,将《诗经》分为婚姻、农作等17个门类来进行编排。而高本汉的《〈诗经〉注释》(1946)和《诗经》(1950)英译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公认为《诗经》西播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其余还有克莱默·宾的英译本,1904年伦敦出版;特赖希林格尔的德译本,1948年苏黎世出版;于贝尔·奥托的法译本,1907年香港出版;韦伯·舍费尔的德译本《古代中国的圣歌》;约翰·肖特曼(John W. Schotman)的荷兰文译本,1969年荷兰德文特出版。1986年12月17日,80岁的耶稣教神父卡梅罗·埃罗杜依由于把《诗经》直接从中文译成西班牙文而获得该年度的西班牙国家翻译奖,书名为《中国歌谣集》。在美国主要还有新诗运动的领袖艾兹拉·庞德(E. Pound, 1885—1972)的《〈诗经〉:孔夫子

的经典》(195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第3版)。目前美国流行的高水平的《诗经》译本有著名汉学家海陶韦(J. R. Hightower)的英译《诗经》(1952),麦克诺顿(W. McNaughton)的译著《诗经》(1971年纽约特怀恩出版社出版),以及华裔著名学者陈世骧、王靖献等的《诗经》选译。

以上研究特点一是以描述性研究居多,对《诗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但缺乏对每一传播阶段性质的不同与变化的分析和阐释,本书在这一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和补充,对其流变、流变的原因及其启示意义都作了较为完整的分析;二是几乎只有单个译者的译介研究,而对多本译著进行历时性考察的研究少,由于对译者文化身份研究不够重视,缺乏对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正确认识,对中西文化传统下不同的文字、思维传统,以及两种传统影响下的诗歌形态与表现的不同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以西方语音逻各斯中心为坐标系统,设定翻译的一系列标准,因而未运用跨文化的眼光去作深入的研究。本书对翻译中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也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

第二方面,《诗经》本体的研究。这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金守拙(G. A. Kennedy)的《〈诗经〉里的失律现象》,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的《〈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诗学里的文类意义》,新加坡学者容世诚的《〈诗经〉的抒情性与主观性初探》,戴维·刘(David Jason Liu)的《〈诗经〉:中国诗歌经典的平行结构》,苏瑟(H. Saussy)的《〈诗经〉的重复、韵律与置换》。皮肯(L. Picken)《〈诗经〉诗篇的形式及其音乐含义》。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hel Granet)的《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C. H. Wang)的《钟与鼓》和《从礼仪到讽喻:中国早期诗歌七论》,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诗经〉中的繁殖与再生》。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诗经〉注释》,加拿大学者多布森

(W. A. C. H. Doboson) 的《〈诗经〉的语言》和《语言学证据和〈诗经〉创作年代》，金守拙的《小雅·宾之初筵》。美国学者麦克诺顿 (William McNaughton) 的《〈诗经〉的综合映象》，余宝琳 (Pauline Yu) 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和《寓言、象征和〈诗经〉》。这些研究主要是单个学者针对《诗经》的某一个侧面进行研究，而缺乏横向联系的综合性研究。本书试图以中西双重视角，对《诗经》在英语世界里的研究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多角度的系统研究，填补这一项空白。

第三方面，《诗经》史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相对来说要较前两个方面弱一点，但在近三四十年，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强，这些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西文化思想的根底，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同时也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成果有：美国学者海陶韦 (James R. Hightower) 《〈韩诗外传〉：韩婴对〈诗经〉教化性应用的范说》和《〈韩诗外传〉与三家诗》，美国学者左伊伦 (S. V. Zoeren) 的《诗歌与人格：中国传统的读解、注疏和阐释学》，美籍华裔蔡任真 (Tsai Yen-zen) 的《经与传：汉代儒家经典的界定》，美国学者登波 (L. S. Dembo) 的《艾兹拉·庞德的〈孔子颂诗集〉》，宇文所安的《诗大序》。

在国内，《诗经》研究专著、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海外《诗经》研究作纵向和横向的多角度研究的专著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论文有：《高本汉著〈诗经〉研究》(张世禄，《说文月刊》，1卷5、6期合刊，1939.6第61~64页)，《〈诗经〉在西方的介绍与研究》(张倩，《文学研究参考》，1988.4)，《〈诗经〉在海外》(王丽娜，《河北师院学报》，1993.2第63~70页)，《〈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周发祥，《文学评论》，1993.6第70~81页)，《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张启成，《贵州大学学报》，1995.2第49~53页)，《西方〈诗经〉学的形成与发展》(王丽娜，《河北师院学报》，1996.4第47~52页)，《〈诗

经》世界》(夏传才,《东方文化》,1997.2第41~45页),《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夏传才,《河北师院学报》,1997.2第70~77页),《英语世界中国先秦至南北朝诗歌之传播》(黄鸣奋,《贵州社会科学》,1997.2第50~55页),《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夏传才,《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公司,1998.6第371~397页)。

本书的研究思路,首先是在第一章对《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做一个纵向的历时性梳理,将《诗经》在西方的流传期分为教会学术期、学术转型期和深化研究学术期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传播中不同阶段的流变、原因和启示意义做较为深入、完整的分析。然后,就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进行译介和研究两个阶段的分段研究。

在第二章中,结合中西文学理论对译本、研究专著和论文进行实证性的考察研究。首先是对英语世界里的全译本进行介绍,指出其不同的特点,然后从赋、比、兴的角度对《诗经》的翻译进行分析,对适合与同根同源的语际间翻译的对等理论指出其运用于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间的语际翻译的不切合性,并进一步指出翻译的目的不可能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同,而是相通,绝对意义上的同一只能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语际翻译的实质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他者”文化身份的认同,尊重“他者”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保持文化之间的“间隔”,如果没有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的“间”,那“跨文化”之“跨”就失去了意义。“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从正面来看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问题,依然是(跨)文化的多元状态之中翻译运作展开问题的一个关键方向。这里,我们要涉及的只是其中含有的‘混杂’或‘杂合’(hybridity)问题。”

第三章主要对诗之起源和诗体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一是对兴

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和阐释，并着重对以兴为主导因素的《诗经》的文类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二是对以民俗学和帕里—劳德理论为理论出发点研究《诗经》的起源、性质和颂、雅、风三阶段的起讫及过渡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指出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局限性，可借鉴性和互补性。

第四章第一节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对高本汉的《诗经注释》和多布森的《语言学证据和〈诗经〉创作年代》进行分析，前者主要分析高氏如何吸取清儒之长，辅以严谨的历史语言比较法和现代学术体例，对《诗经》字词的解释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后者主要从早期古汉语和晚期古汉语的意义演变和使用几率的变化，推证出与王氏运用套语理论得出的基本相同的结果，即《颂》、《大雅》、《小雅》、《国风》的年代顺序。第二节从意象理论出发，对余宝琳的《寓言、寓言化与〈诗经〉》和麦克诺顿的《〈诗经〉的复合意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前者首先对寓言、寓言化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中西寓言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在对中国古代寓言的起源与比兴思维的关系辨析中，阐述了孔子在神话与叙事之间的寓言时代是如何继承神话思维形式和摒弃神话思维的超自然观念，并将兴诗奉为儒家人格修养的起点，提出“诗可以兴”的命题，使诗性智慧的理性之光一直闪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随后，作者对《诗经》的寓言化阐释的形成与发展作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后者主要对《诗经》的意象组合进行分类与阐述，并对意象组合的动态特征和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命题——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征作了细致的分解。

第五章是从诗经学史的角度对海陶玮的《〈韩诗外传〉与三家诗》和左伊伦的《诗歌与人格：中国传统的读解、注疏和阐释学》进行了描述、分析和对比。第一节：海陶玮《韩诗外传》。该节从《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的具体分析论证《内传》合于《外传》，构成“6+4”的观点，阐述了《韩传》与《毛传》之关

系。第二节：左伊伦《诗歌与人格：中国传统的读解、注疏和阐释学》。佐氏认为，从夏商周三代经由孔子及其后各代《诗经》注释家对诗的阐释构筑了中国文学阐释学之道，而阐释原则的关键在于对“诗言志”中“志”的把握。佐氏通过对《论语》的详尽分析，以时间为序，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以乐论诗的早期阶段，前文本过渡阶段和文本形式凸现阶段。因此，在第一阶段中，他从志之内涵与人格的关系入手，阐明了“雅颂各得其所”是指孔子以其高深的音乐修养和精湛的技艺对《诗经》进行了修正，使雅颂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演奏，并对所谓淫诗编纂入集作了说明。在第三阶段，诗之志开始过渡到志的外延——谏、劝、美、刺，他特别提示说，这一阶段的言诗说教和历史中的孔子之间保持着一种最微弱的联系。在以上各章中，本书将重心放在对西方诗经学中理论的运用的得失进行考察，并对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借鉴其研究成果，对其有偏差的错用、错位现象进行分析，在既有对话的基础之上延续中西之间的有效对话，从而促进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跨文化对话法”展开比较研究，因研究对象在不同文化身份的转换中进行交替比较研究，所以呈现出多重视角。研究者一方面以自身为对象进行独立研究，探讨从自身文化氛围中产生出的文学范畴与命题；另一方面又以对方审美理论的问题视角作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以“他者”的眼光去观察比较，而本文又以另一个“他者”的角度去考察，同时也以“他者”的眼光反观自身。对中西两种都已发展成熟而又迥然相异的文化系统，本书站在一种学理性的学术性立场，尊重平等的个性比较研究，“兼听则明”，延续既有的有效对话，避免用一方理论框架裁割另一方的文学材料而使其文化特征被架空，从而使比较成为虚无的研究。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本书努力将一方的问题视角、言说方式放在另一方的文化历史环境中进行考



查，对这一言说方式在两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不同体现予以比较，在对比的基础上突显出各自的特征。王国维曾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余谓中西二字，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

张其成《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张其成《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张其成《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张其成《中国思想史》（第二卷）